

毛共拉攏美國之意圖

林國雄

壹 毛共的一貫反美立場

基於思想、意識、制度的差異，共黨政權與西方國家壁壘的形成實乃必然。毛共之自始反美也就事出有因，其間縱有程度上的強弱，亦祇由於情勢考慮及策略運用而已，「世界革命」的目標絕不會有絲毫改變。

早在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之時，美國便被列為其所要打倒和推翻的「國際帝國主義」者之一，雖也曾因德蘇戰爭的爆發，毛共反美政策被迫修正，強調「對英美的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瀕臨尾聲之際，「無產階級祖國」蘇聯面臨之威脅解除，毛澤東即連續為文三篇，從「愚公移山」到「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攻擊美國政府不遺餘力。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共北平市工委會宣傳部祕密頒發一項「關於反美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體黨員「深切認識美帝國主義的反動面目」，「儘情揭發一切美國的侵略事實、不法行為」，「要使北平人民對日本人的仇恨移植到美國人身上」。此後，由毛共發起的反美運動如火如荼地在中國大陸全面展開，圖進一步破壞中美關係，促美軍退出中國。

及至中國大陸岌岌可危，美政府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發表對華關係白皮書，推卸美對華政策失敗的責任。一週後，「新華社」撰文評之為「無可奈何的供狀」，毛酋更以「丟掉幻想，準備戰鬥」回答之，鼓動大規模反美宣傳，藉以確立美國是其主要敵人的戰略觀念。

大陸淪陷之後，毛共更是變本加厲，宣佈了「一邊倒」政策，拘捕並虐待美國外交及領事人員。迄韓戰發生，毛共「志願軍」直接與美軍對峙，這才粉碎了華盛頓與北平「建交」的幻想，迫使美國重估其遠東政策。

「抗美援朝」期間，中共提出「怎樣認識美國的宣傳提綱」，該文件主

要有三個觀點：

(一) 仇視美國，因為其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二) 鄙視美國，因它是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

(三) 蔑視美國，因為它是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註一）。

一九五四年開始，北平對外改採和平攻勢，在中共主動之下而有翌年八月的毛「日內瓦大使級會談」（註二），但這並非代表毛共有解決具體問題之誠意，而係以另一姿態，展開國際統戰策略，達其反美目的，因而也註定了美毛會談失敗的命運。

自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起，中蘇共間對當前世界形勢的看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方面，產生了歧見，尤其對美國的評估，有了嚴重的分歧。此後，中共就指責赫魯雪夫「把美國政府及其首腦看作是抵抗戰爭勢力的人，而不是帝國主義戰爭勢力的代表」，並「歪曲列寧的關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正確原則」（註三）。北平堅認，「現代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是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祇有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抨擊蘇聯與「美帝」勾結，「美化帝國主義」，「在人民羣眾中散佈的帝國主義，特別是對美帝國主義的幻想」，並盡量「替美帝國主義塗脂抹粉」（註四）。無疑地，自毛俄有了磨擦開始，北平即以反對「美帝」的世界旗手自居，不斷號召各國人民結成廣泛的反美統一戰線了。

本來，在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莫斯科會議」中，毛俄又對一系列原則性問題有所爭議，由於中共代表團之堅持，宣言內終增加或補充了下列內容：「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人民羣眾的最凶惡的敵人」，「帝國主義如果發動世界戰爭就註定滅亡」，「資本主義和社會

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等（註五）。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俄毛又掀起了「更加尖銳的爭論」，通過的聲明中，如「關於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的論點」、「關於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的論點」、「關於建立最廣泛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的論點」、「關於在處於美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和軍事統治下的某些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階級和人民羣衆的主要打擊是針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也針對出賣民族利益的壟斷資本和國內其他反動勢力的論點」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團和其他一些兄弟黨代表團的意見的」（註六）。顯然，毛共於共產世界及國際間已經成了反美先鋒，並以此作為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方針之一。

一九六五年越戰昇高，毛共在大陸上展開「援越抗美運動」，強調「一旦與美國的戰爭爆發，戰爭將無界線」，藉支持越戰拖垮美國。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則誣指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狂妄的侵略者」，因此必須「把鬥爭的主要鋒芒指向美帝國主義」。縱使「文革」之後所通過的新黨章總綱中，確定了「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的「三反」路線，仍是以美國為首要的鬥爭對象。這都足以說明中共反美的一貫性與堅定性。

貳 毛共對美態度的轉向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暫告段落之後，毛周雖暫時取得奪權鬥爭的成功，但其黨政機構仍陷癱瘓，統治地位未臻穩固，內部動盪仍未完全平息，在此情況下，毛共最恐懼於美蘇之勾結，況其時北平已感受到莫斯科極大的軍事壓力（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發生），蘇俄出兵捷克記憶猶新，這些當是促使中共重新考慮採取對美統戰之一重要理由。

尼克森當選為美國第三十七屆總統，毛共即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間向美國政府建議，於尼氏就職後一個月（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日）恢復自當年一月以來中斷的華沙會談，並雙方就「和平共處五原則」達成協定。然因北平駐荷蘭「臨時代辦」廖和叔投奔自由，毛共乃藉口取消原定之會談。俟尼氏發表就職演說，提出「談判代替對抗」口號，毛共隨即評論這篇講辭是「美帝國主義走投無路的自供狀，對於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一種絕妙的反面教材」，批評

尼克森玩弄「團結」、「和平」、「精神」字眼，但對所謂「談判時代」却没有半字褒貶，似乎暗示可以「談判」，在共黨觀念亦即進入另一種「針鋒相對」鬥爭的形式。同時，毛共理論刊物「紅旗」也刊載了尼克森演說全文（註七），這是少有之現象。

根據卡諾（Stanley Karnow）教授分析，周恩來之決定爭取美國，因素之一乃出自於馬列主義觀點之考慮。從共黨意識着眼，北平認為美共關係代表「壟斷資本家」之利益，亦真正代表了美國的「統治階級」，就此而言，北平乃希望與掌有實際力量之政黨領袖打交道（註八）。若以毛共過去經驗而論，則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記者特里爾（Ross Terrill）於一九七一年訪問中國大陸四十天後指出，在其與周恩來會談中，可以察覺出毛共對美國民主黨的不可信賴，而一位共方官員也對特氏提到，二十多年來之實例顯示，民主黨易於跟莫斯科有所勾搭，尤其現階段更常對蘇俄示好（註九）。這些解釋當然不足以說明毛共在一九七〇年代有與共和黨的尼克森進行交易之必然性，況且尼氏就職前後之中共對美態度並未真正轉向，而僅係處於試探階段，並對美國新任總統之對外政策動向作進一步觀察。

尼克森總統上任以後，時時聲稱美國政府的長期目標在和北平建立正常化關係以及解除中共在國際間的孤立狀態，於是一再求取與毛共的接觸途徑，並採取片面示惠措施。首先，透過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代為傳達美國對毛的新態度，繼而與巴基斯坦的亞雅（Agha Mohamad Yajha Khan）及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詳細討論了美毛關係。同時，美國在一九六九年初放寬對中國大陸的旅行限制，允許美國旅外遊客及居民攜帶貨物進入美國。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美毛雙方恢復了中斷整整兩年的第一三五次華沙會談，這是尼克森就任後的首次與北平直接接觸。美駐波蘭大使史托塞爾（Walter J. Stoessel Jr.）於一個月後的第三六次會談中，更向毛共「代辦」雷陽提出，稱尼克森欲遣派一名高級官員至北平以表示美國對改善二者關係的誠意（註十）。毛共原擬於同年五月二十日之另一次會談就上項建議給予答覆，但逢柬埔寨政變，施亞努政權被推翻，美軍揮兵入柬，北平除譴責美國侵略外，毛曾並於五月二十日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

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至此，華沙會談宣告結束，毛共對美之新姿態猶在欲進還退，遲疑未決的階段中。

中共一九七〇年九月的「九屆二中全會」，或許是其目今統戰外交路線的最後確立；且尼克森仍繼續放寬對中國大陸的旅行、貿易限制，經由巴基斯坦與羅馬尼亞代表之從中說合，終於，毛共有了反應，這就正式確定毛共對美策略的轉變。

美左傾記者史諾(Edgar P. Snow)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與毛澤東作了長達五小時的談話，後者明白表示歡迎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尼克森赴北平訪問，以解決兩者間的問題(註十一)。翌年四月，毛曾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我們應該採取主動」，乃親自決定發動乒乓攻勢(註十二)，邀請美國桌球隊訪問大陸。毛共這種對美態度的公開轉向(雖戰略目標未變)，相信有其本身不得已之苦衷與隱藏若干陰險之企圖；同時也冒着幾許策略全盤改變所帶來之危險，這亦就是周恩來多次強調「乒乓外交」乃毛曾個人所作決定之動機所在。

到了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季辛吉秘密潛往北平，與周恩來會談二十個小時，事後隨即宣佈尼克森總統將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訪問中國大陸。美毛由幕後接觸到正面勾搭，至此真相大白。

固然，中共絕不致放棄「埋葬美帝」之基本目標，但公然邀請「中國人民的死敵」、「戰爭販子」尼克森到了大陸，這種由打倒「美帝」到拉攏「美帝」鬥爭形式上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必然遭到相當大的阻力，為其本身帶來極大的困擾，這該是毛周等人所能逆料到的。

上項訪問消息發佈後第五日，毛共曾發出一文件，其中開頭便承認道，邀訪尼克森一事是由毛曾決定的，「中央有部分同志一度有不滿意見，經過反覆辯論，始統一了認識」。兩個月後，「林彪事件」發生，一般都認為因素之一可能為林彪等不贊同毛、周的聯美措施，「莫斯科華語廣播」更斬鐵截釘地說道：「九月在北京領導內部發生的政治危機的一個原因，是就尼克森訪華一事而產生了嚴重分歧，更簡單的說：就是對待尼克森的態度問題而產生嚴重的分歧」(註十三)。「紅旗」雜誌一九七二年第八期則發表了「掌握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一文，指毛曾的革命外交路線取得了新成果，「批修整風運動的偉大勝利(應指林系之被剷除)，對社會帝國主義(北

平描述莫斯科之慣用語)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明言「修正主義是國際現象，黨內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跳出來表演，也有國際方面的原因，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為了顛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總是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代理人，而隱藏在黨內的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也總要到他們的那裏去尋找靠山，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黨陰謀活動，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同樣是有國際背景的」。可知毛共相信「九月危機」是與蘇俄有關，林系一伙之不贊成拉美反蘇，也就十分明顯，毛周之邀請尼氏訪問，也確係一局險棋。

去年的尼周聯合公報，其主要內容之一乃雙方同意在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新聞等方面進行人民之間的連繫和交流，並逐步發展雙邊貿易關係。此後，除美國派遣官員定期赴北平外，雙方代表也在巴黎進行了十四次會談。毛共不斷邀請美政府人員、記者、學生、科技專家、學者等到了大陸，本身亦先後派出乒乓隊、醫生、科學家代表團、雜技團團員赴美進行活動，遂行爭取、統戰工作。

今年二月十五日，季辛吉第五度走訪中國大陸，毛曾於十七日出乎意料外地予以會見，雙方「在無拘束的氣氛中進行了坦率 and 廣泛的談話」歷兩小時。毛共喉舌對季辛吉訪問一事大肆宣傳，「人民日報」第一版廣予報導，連這位安全顧問事後也說：「我們是以不尋常的禮遇被接待」。直至廿二日公報發表，會談結果揭露，更見毛共取悅「美帝」之一般。

(一)公報中的唯一具體協議是「每一方將在不久的將來在對方的首都建立一個聯絡處」。本來，尼克森早於去年二月即向共方提出設置類似貿易常駐機構之建議，但為中共所拒。據美方人士暗示，此次的決定加速雙方「關係正常化」(美國務院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葛林(Marshall Green)曾作解釋，「關係正常化」並非意即「邦交正常化」)並設立享有外交特權的「貿易辦事處」，係北平方面採取主動。周恩來曾不止一次地對外國訪客聲稱，凡有我中華民國使館所在地，它決不設立「官方代表機構」，中美維持邦交之情況下，毛共派遣代表前來華府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如今，韓敘等先遣小組人員已抵華府籌設雖無「外交」其名，却有其實的所謂「聯絡辦事處」，也難怪克里姆林宮當局要一再抨擊毛共接受「兩個中國」政策了。

(二)公報中僅重申了去年二月「上海公報」確立的各項原則，其一即美

國「將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 and 軍事設施」。當會談內容未公開前，國際間紛紛揣測，毛共可能要求美國自台撤軍，蓋正值越戰停火，美毛和解，北平大可藉口中南半島及台灣海峽緊張情勢緩和，促美軍撤出台灣。但公報對此隻字未提，且季辛吉在記者會中強調，美國並無立即從台灣撤回其軍隊之計劃，而有關美國駐台軍隊人數的多寡，並不在此次北平談判的討論之列。至於毛共一九六〇年後所堅持之先解決「台灣問題」，再就其他細節問題與美國談判的原則，在這次會談間也被拋棄，雙方各自陳述對此問題的不同看法，美國也說明了它的一般義務及維持與我外交關係之意願。葛林則在公開演說中指出，「台灣問題」本身及其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及防衛義務均不構成改善美毛雙邊關係之障礙。

此外，毛共提前於三月十二日釋放原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唐尼（John T. Downey），十五日釋放了海軍中校弗林（Robert J. Flynn），空軍少校史密斯（Philip E. Smith），這又是對美示好的表現。

叁 毛共拉攏美國的意圖

以上敘述可以看出，北平是如何的由一貫堅決反美轉變到曲意迎合勾搭，近期更不惜主動讓步，顧不了堅守已久之原則，這種出乎尋常的舉動，其中必然大有文章，亦即必定有其難以克服的必然因素與懷有不測之居心在。毛共的對美表示「友好」，其明顯的理由與企圖有幾：

(一) 恐懼蘇俄的軍事威脅

自北平與莫斯科公開絕裂之後，邊界情勢一直處於緊張僵持狀態，一九六九年三月的珍寶島事件，更使雙方由理論鬥爭演變到武裝衝突。此期間的毛共，憂慮莫斯科主子將「布里茲涅夫主義」用之於中國大陸，因之據稱毛曾當時對穆比勒（M. Couve de Murville）的談話，即曾有歡迎與美改善關係之表示（註十四）。北平報紙亦大肆叫囂，攻訐蘇俄脅迫華沙條約組織各國支持其對毛共的軍事冒險與不斷大量增兵中俄邊境，抨擊莫斯科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建立龐大海軍基地網，加緊同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勾搭，對印度及印尼提供大量軍援，同日本政府之軍事勾結亦日趨公開化（註十五）。毛共對蘇俄從海陸兩線鉗形圍堵之部署，其恐懼之情溢於言表。

毛共拉攏美國之意圖

根據去年四月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發表的調查報告，時共有俄軍四十四個師沿着長達四千哩的中蘇邊境駐紮，其兵力約佔蘇俄全部陸軍的四分之一，較之一九六九年增加三倍。俄軍配備有核子武器，於空中支援、火力及機動性方面都優於中共甚多。此外，以北平為目標的飛彈基地已在外蒙境內建立（註十六）。況且蘇俄有繼續增兵邊界之勢，在歐洲尋求和解以便全力東向，並大力爭取環繞中國大陸四圍的民主國家或共黨政權，構成對毛共的迂迴包圍，更令毛共坐枕難安。因此，美國眾院兩黨領袖訪平歸美後，謂北平希望美國不要單方面裁減核子武力與軍備，不要完全自亞洲太平洋地區撤退，免得蘇俄填補其所遺留下來的真空狀態（註十七），相信此語不會是憑空杜撰，且具有不可否認的權威性（兩黨領袖曾與周恩來晤談五個小時，又同喬冠華談話三小時）。

由上情推斷，毛共對蘇俄深懷恐懼實為必然之事。周恩來也常於對外籍人士談話中，流露出憂慮俄共壓力的情緒，例如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即對紐約時報副社長雷斯頓（James Reston）表示，中共對邊境俄軍的大規模動員甚表關切，並稱中國大陸的大中型城市皆已構築地下坑道，倘俄軍進犯，隨時予以回擊（註十八）。去年年底，周曾曾以近四小時的時間會見美專欄作家艾索蒲（Joseph Alsop），主要論及多年來蘇俄如何想要消滅毛共並以先發制人方式摧毀毛共發展核子武器之計劃，周也談到赫魯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於一九五五年便向當時西德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提出有關「黃禍」的警告（註十九）。此項事實，也就迫使毛共投向美國，聯美制俄。

就在此次季辛吉抵達北平前幾天，蘇俄曾試射九枚洲際彈道飛彈越過中國北方的亞洲地區，其用心不言而喻。一位美國官員據此評論道：這至少顯示蘇俄攻擊中共的可能性不但不能被忽略，且實質上在推進之中（註二十）。俄共的軍事威脅，加速了北平向華府靠攏，「聯絡辦事處」的同意設立，此即主要因素之一。

(二) 掩飾政權內部的不穩

美國學者魯濱遜（Thomas W. Robinson）著文探討毛共對美、俄、日三角關係時，一開頭便指出：中共邀請尼克森訪問，此一對外新政策乃其

本身無法駕馭下的許多內外因素的產物（註二十一）。這種非毛周所能控制的內部因素，就在於繼承人問題的嚴重，偽政權的不穩定。

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軍人勢力日漸膨脹，迫使文革派的主將陳伯達遭致整肅，「黨指揮槍，槍指揮黨」問題更趨惡化，毛曾受到威脅日深，這一權力上的衝突導使林彪的被鬥（雖亦可能毛、林對「和美」或「聯蘇」政策形成分歧，而加速原已不可避免的一場鬥爭的爆發）。

「林彪事件」的發生，使得毛共文革創傷未復之際又增添了新的危機。中共自稱，毛林間的鬥爭是其黨成立以來最嚴重、最激烈的路線鬥爭，這場鬥爭目前「正在逐步深入」，離結束尚遠。迄今，因林案已被整肅及可能整肅的重要共軍頭目約計六十人，這些空出的軍事領導職位至今無法派人遞補，例如「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長」、「空軍司令員」、「海軍政委」、「裝甲兵司令員」等被整之後，其位仍是虛懸。至於九屆政治局廿五名成員，則因林案整垮了八個，各省級委員會書記職位以上幹部受整肅者亦達十五人。可知「林彪事件」株連之廣，中共黨政軍機構所受衝擊之大。

今年元旦「兩報一刊」聯合社論，毛共仍以「批修整風」列於對內各項重要任務的首位，作為在這新的一年內，還要全力以赴的「頭等大事」，可見大陸內部「九月危機」餘燼未熄；偽「四屆人大」無法召開，各級領導班子殘缺不全，「接班人」問題無以解決，亦可見毛共內部仍困難重重；因此，毛周企圖以外交上的突破、對美關係的正常化來打開一條出路，轉移不滿情緒，藉對外路線的成就壓制反對份子，緩和內部危機，求取情勢的穩定。這與一些國際人士認為毛共在外交上的活躍，對美統戰拉攏之積極，乃是大陸情勢業已穩定之看法互異。

(三) 分化美國與盟邦關係

中華民國政府屹立台灣，對毛偽政權構成嚴重的威脅，毛共時時刻刻都有芒刺在背之感。因此二十多年來，毛共一直沒有停止「解放台灣」的叫囂，但由於國軍力量的強大，中美關係的密切，美國的協防台灣，令中共野心未能得逞。因此，北平改變策略，對美接近爭取，以達其離間中美友好關係之目的，使中華民國陷於孤立。同時，毛共此次雖未向美國提出自台撤軍要

求，但其之同意與美國設立牛外交機構，二者關係進一步解凍，固由於內外因素所迫，但毛共亦會在適當時機藉口該地區情勢緩和，促美國撤回在台武裝力量與軍事設施，並進而妄圖解決所謂「台灣問題」。

毛共在亞洲另一心腹之患則是日本，這就是其不斷攻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理由所在。以日本雄厚的經濟實力，進步的科學技術，自然力足以發展核子軍備，使北平面臨來自東方的又一挑戰。延遲日本整軍經武方法之一，則是聯美制俄以明毛共無犯美之心，使得美國不致扶植日本共同圍堵中國大陸，也換取美國不再武裝日本之承諾，繼續使這一島國生存於美國核子傘保護之下。據此，周恩來向美國眾院兩黨領袖示意，願見美國維持勢力於太平洋地區，而季辛吉第五次訪平歸美後亦鄭重表示，對美日友好關係，毛共並無「任何壓力」，也即一般相信，過去一度遭受毛共猛烈抨擊的美日安保條約，現已為其所「默認」或「接受」。

(四) 便利對美的滲透顛覆

今年二月的美毛公報，其中雙方約定擴大貿易、科學、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交流，為此，每一方將在他方建立一個聯絡處。

「乒乓外交」以來，毛共廣泛邀請美國各階層人士往訪中國大陸，尼周聯合公報則答允雙方增進文化交流，如今毛共又同意擴大二者間各方面之接觸。究竟北平熱中於與美進行所謂文化交流之用心何在，我們可以自邀訪尼克森消息宣佈後，其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印發題為「國際形勢宣傳提要」之對內文件窺之，其中指出：「為了發展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爭取機會，創造條件，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從思想上、輿論上幫助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美國的反動統治」（註二十二）。「紐約時報」記者杜平（Seymour Topping）也於美桌球代表隊訪平後不久，自北平撰文，謂周恩來將允許美記者、學人及其他人士進入中國大陸，因其相信此一計劃有助於美國大眾輿論，影響華府對北平政策的加速轉變（註二十三）。杜平在另一報導中對此有一較詳盡的分析，其中指出幾點：（1）北平覺得美國大眾是其強有力的盟軍，助其實現對外政策之目標；（2）北平邀請具有最大影響力或最同情毛偽政權之美國公民前往大陸，經過統戰及參觀安排，他們相信可以說服該批人民支持中共之外交政策；（3）毛曾認為美國社會正走向

崩潰和瀕臨革命，為支持此項論點，北平將目標指向美國內部的反越戰示威，種族糾紛及經濟混亂（註二十四）。簡言之，毛共便是要利用文化交流關係，「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加強對美國的滲透顛覆，影響民意，遂行其各項政治陰謀，以推翻美國政府為最後目標。若以近兩年的事實情況觀之，毛共所邀請的不正是大半都屬美國朝野名流、黑人領袖、「進步」團體、左傾親毛組織及學者、前親中共份子、傾毛或中立之記者、學生等。相信毛共今後仍會繼續對其審慎選擇的美國「友人」發出邀請。

身為「中（共）美關係全國委員會」主要成員之一，「圍堵而不孤立」名詞的創始人巴奈特（A. Doak Barnett），曾經寫道：廣義地說，中共「人民外交」深具強烈的顛覆目標，事實上，它可被稱之為「公開的顛覆」（Overt Subversion）。自北平觀點而言，「人民外交」基本上是一種政治武器，幫助達成其長期的革命目標，並由於此一目標的實質，使得中共的對外文化交流亦被其顛覆目的所誘導、激發（註二十五）。毛共已曾派出桌球隊、雜技團、醫學科學代表團到了美國，今後還同意遣派各種團體赴美，表面上是進行文化交流，對美國擺出「親善」、「友好」姿態，實質上則大力推動對美的統戰滲透。況北平於華府設立「聯絡辦事處」，利用「外交特權」的掩護，正可施展其挑撥、煽惑、顛覆的詭謀。現階段毛共的拉攏美國，其企圖強化對美之滲透顛覆，應是其居心之一。

（五）毛共經濟因素的考慮

北平投向美國的一項重要但為人忽略的因素是出自於經濟方面的考慮，這就是加恩教授（Mark Gayn）於文中所稱：由於經濟自主原則遲緩了毛共的工業發展，因此其乃亟欲獲取外國之精密設備或貸款，這即影響其對外關係步向正常的部份原因（註廿六）。

當中共藉口廖和叔事件而取消原定的華沙會談之際，正係美政府向中共提出雙方交換科學家和科學知識及郵電交通時（註二十七），亦即北平對尼克森外交動向靜觀的開始。以後，華府繼續對此施以誘惑，例如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P. Rogers）一九七一年一月說道：「允許與任何國家的科學家和科學機構交換非機密性的科學和技術資料是我政府的一般政策，而不管我們與該一國家的外交關係如何」；同年五月，羅吉斯再肯確表示上一原則同

樣適用於中共，甚至認為這種資料交換是與北平建立更佳合作關係的一有效步驟；美國政府對於該國科學機構邀請毛共科學人員赴美參加會議一事感到高興，並對此項問題深表興趣（註二十八）。這對急需先進國家的科學知識、技術及裝備的毛偽政權而言，引誘性是相當大的，也許因為此項資料交換而使美毛「建立了更佳合作關係」。

中共原係堅持，祇要中美兩國有科學聯繫存在，則其不擬與美國開始正式交換關係（註二十九）。然而，北平不僅大量邀請美國計算機科學家、高分子學家、生物學家、心臟病專家、耳科專家、數學家及「科學家協會代表團」等前往中國大陸，且去年十一月先後由吳蔚然率領一個醫學代表團及貝時璋所率科學家代表團到美國各主要城市進行訪問活動，參觀研究中心。今年二月發表的公報，雙方同意今後進一步增進貿易及擴大科學交流。

代表美國十四家廠商赴廣州及北平作貿易談判的胡斯（Harred Pettus Jones）報告道：毛共負責人員明白答覆，他們向美國購買「現代化工業」之興趣大於普通消費貨品，亦即重工業機器、全套工廠、機械工具、計算機、開採及提煉油鑽設備（註三十）。剛於今年一月結束中國大陸之行的巴奈特也稱，與文革期間強調「自力更生」成明顯對比的是，毛共目今技術差距及設備陳舊情況下，注重從國外輸入現代化技術（註三十一）。毛共急於購進美國的高級精密的機器設備，一年來已進行了實際交易，如訂購十架波音七〇七客機，以二百三十萬美元購得為轉播尼克森訪問大陸實況而設於上海的地面轉播站裝置。另美國商務部也批准了生產綜合纖維及乙炔基氯化物工廠之技術資料輸往北平，其中前者工廠設備達八百萬美元，後者有一百五十萬元。同時亦批准出口值十一萬五千美金之美製航空及鐵道電子裝備及七十萬元的照相軟片，但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商務部禁止測震裝備出口，「因這項裝備能移作軍用用途，如飛彈試驗即是」（註三十二）。

此外，去年大陸糧食減產（周恩來去年十一月對外國記者承認，其比一九七一年減產了百分之四，但日本方面消息透露其減產比例高至百分之十二），鋼鐵、原油、化學肥料產量亦較前年降低，大陸各地普遍是天災蟲害，造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難以推進（註三十三）。毛共當然也求助美國，度過此一難關。

肆 結語

在毛共推行「世界革命」的進程中，美國是其主要的阻力，因之毛偽政權自始即以「埋葬美帝」為其基本目標。北平與莫斯科公開分裂之後，毛共更以反美的世界旗手自居，那一階段的美毛之間祇能是你死我活的對抗關係。一九七一年開始，北平鑒於內外情勢的考慮，終於暫時改採「和美」策略，此一對外路線的大轉變，不但在受過長期反美宣傳和仇美教育的大陸軍民中，一時難以適應和接受，且遭致黨軍領導階層的極大反抗，加速危機之爆發。由此顯見毛、周之決定與美「修好」實有孤注一擲之勢，亦即被某些因素所迫而不得不為。

尼克森下令對北越海面佈雷，並沒有影響毛共的繼續向美靠攏，季辛吉的第五度訪平，更見中共的「取悅」醜態，且自棄原則，同意在我設有使館的華府成立「辦事處」。這一切不尋常表現，並非表示毛共目今對美國有了偏愛或背離打倒「美帝」的最高目標，而是顯出現階段毛共是拉美益急，有所求於美國。

究竟迫使北平對美大幅轉向之理由為何？此中有其不可抗拒的事實，其一在於蘇俄的軍事甚或戰爭威脅，其二便是政權內部的不穩定。至於藉着拉攏美國以離間自由盟邦關係，強化對美統戰滲透，求取科技知識以增強「世界革命」之實力等，則是毛共另懷之居心，自由世界對此當須更加提高警惕。

附註

註一·見「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頁六七四—六八一。

註二·Details are in Kenneth T.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1967*, N. Y.: Mc 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8.

註三·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頁六七。

註四·「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

註五·同註三，頁七九。

註六·同前註，頁九二—三。

註七·「紅旗」雜誌，一九六九年第二期，頁十一—四。

註八·The Japan Times, August 5, 1971, p. 14.

註九·Ross Terrill, 800,000,000: the Real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2, p. 147. 美故國務卿杜勒斯雖堅決反對毛共，但韓戰停火協定是在艾森豪總統之下達成的。毛曾一九七〇年底對美記者史諾之談話中，亦抱怨杜魯門與艾奇遜製造了「台灣問題」。

註十·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1972, p. 6.

註十一·Edgar Snow,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Life, April 30, 1971, pp. 46-48.

註十二·Time, October 23, 1972, p. 26.

註十三·「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播。

註十四·W. A. C. Adie, "One World Restore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on a New Footing," Asian Survey, vol. XII, no. 5, May 1972, p. 375.

註十五·如見「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三月廿一日。

註十六·The Times (London), May 2, 1972, p. 6.

註十七·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10, 1972, p. 18.

註十八·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1971, p. 1.

註十九·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4, 1972, p. 22 and December 6, 1972, p. 17.

註二十·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1973, p. 4.

註二十一·Thomas W. Robinson, "The View from Peking: China's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Pacific Affairs, vol. 45, no. 3, Fall 1972, p. 333.

註二十二·該文件要點刊載於一九七二年二月廿四日台北「中央日報」。

註二十三·Report from Red China, by The New York Times, N. Y.: Avon Books, 1972, p. 45.

註二十四·Report from Red China, pp. 51-54.

註二十五·A. De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N. Y.: Harper and Brothers, 1960, p. 148.

註二十六·Mark Gayn, "Who After Mao?" Foreign Affairs, vol. 51, no. 2, January 1973, p. 303.

註二十七·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LX, no. 1550, March 10, 1969, p. 197.

註二十八·Same, vol. LXIV, no. 1668, June 14, 1971, p. 767.

註二十九·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5, 1972, p. 1.

註三十·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19, 1972, p. 13.

註三十一·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8, 1973, p. 102.

註三十二·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8, 1972, p. 12.

註三十三·Same, March 1, 1973, p. 11.